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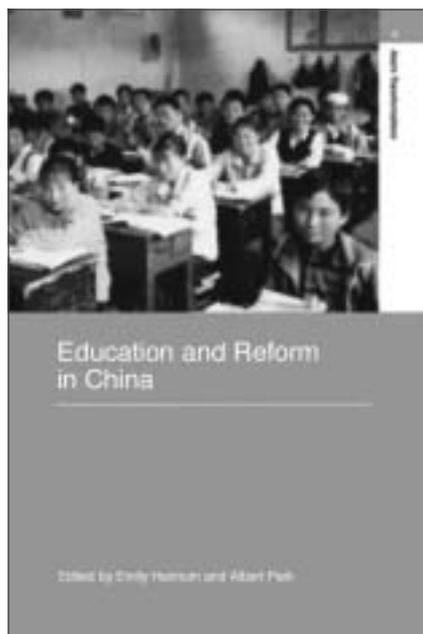
制度各方面融合貫通，讓讀者有充分的基礎去感受正德時代的氣氛，是絕好的歷史通識教材！

本文開頭，說韋老用蘇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的「老夫聊發少年狂」七字自況。筆者想起辛棄

疾詞《水調歌頭·題張晉英提舉玉峰樓》，有十字，其口氣、精神，均可與「老夫聊發少年狂」相呼應，擬引述之以贈韋老，並再次祝賀韋老《正德風雲》之出版！這十字是：「我老尚能賦，風月試追陪。」

## 市場轉型與中國教育改革

### ● 閔引堂



Emily Hannum and Albert Park, eds.,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中國近三十年的市場改革，被社會學界譽為堪與工業革命時期歐美社會轉型相並提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市場改革對中國社會分層的

影響已成為西方社會學研究中一個甚為活躍的領域，在中國市場改革經驗基礎上，初步形成一種轉型社會學理論，吸引了很多西方社會學者參與。與社會分層研究相比，西方學者對市場改革背景下中國教育發展的研究卻相對較為遲緩，儘管教育被認為是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動因。但隨着市場改革的深入，中國教育問題逐漸引起西方學者的關注。特別是近十年來，西方學者對中國教育發展的關注度在持續上升，有關研究大致包括三個領域：一是教育與社會分層；二是教育經費、入學機會；三是教育回報。

由美國學者韓怡梅 (Emily Hannum) 和帕克 (Albert Park) 主編的《中國教育與改革》(以下簡稱《改革》，引用只註頁碼) 一書，聚集了美國、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經濟學、社會學和教育學方面的學者，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教育改革的經驗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研究，涵蓋了上述三個領域。書中大多數論文具有深度的數據，讀者藉此可以真實地了解市場改革對中國教育的衝

與社會分層研究相比，西方學者對市場改革背景下中國教育發展的研究卻相對較為遲緩，儘管教育被認為是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動因。但隨着市場改革的深入，中國教育問題逐漸引起西方學者的關注。

市場改革對教育機會和教育經費的影響逐漸凸現，無論宗族、地域、性別還是戶口制度，都不是單一地發揮作用，而是與市場相互交織，影響中國兒童的教育機會。

擊和挑戰。因此，該書在展示中國教育改革的經驗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改革》一書的第一個專題是「市場改革背景下的入學機會和經費投入」，收錄了六篇文章，主要探討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對農村學校教育經費投入、入學機會、少數民族兒童和民工子女教育機會的影響。

198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開始實施財政分權的政策，教育經費由縣級政府部門統籌。在教育經費籌措中，引入市場機制，允許多種渠道籌集教育經費。由於經濟發達地區比貧困地區有更多的經濟來源，地區間教育經費的差距不斷擴大。一些貧困地區因缺少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和上一級政府的經濟資助，陷入經濟困境。同一個省內，甚至同一個縣內，學校教育經費的差距也在擴大。1990年代中期，國家設置專項資金，資助經濟落後地區的學校教育，縮小地區間公共教育投入的差距。這一政策變化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但對教育經費的變化趨勢缺少長時段分析。李文、帕克及汪三貴的文章通過對1993、1997、2000年全國和甘肅省二十個縣小學教育經費數據的比較分析，展現了這一政策變化對學校教育經費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無論是財政分權制度，還是國家財政補助政策，都沒有縮小農村學校教育經費的差距，農村小學教育經費的不均衡現狀並沒有徹底改變。

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私立教育迅速發展，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林景的文章對中國私立學校發展的社會背景、私立教育的類型和私立教育對社會平等的影響等

問題作了系統的分析，借助目前積累的相關文獻，林景重點對精英私立學校、普通私立學校和私立大學的生源、教師和教學作了細緻的描述。

牛瑞琴 (Rachel Connelly) 和鄭真真的兩篇文章主要從入學機會的角度，探討1990年以來中國適齡兒童入學趨勢的變化，並以地域、性別為主要比較因素，通過地域、性別與入學人數相關性的分析，表明1990至2000年間入學人數的總量在增加，城鄉差異和性別差異對入學機會的影響雖然減弱，但地域、性別對入學機會的影響仍然存在，入學機會的不平等仍較為明顯。

少數民族兒童入學率低的問題是教育人類學研究的經典問題之一，目前已經形成兩種解釋：一種認為少數民族兒童入學率低是因為經濟貧困；另一種認為，文化衝突，特別是土著文化與現代性之間的衝突，是少數民族家庭拒絕讓子女上學的主要原因。白傑瑞 (Gerard A. Postiglione) 的文章應用作者在西藏鄉村收集的一手資料進行研究。經驗分析表明，藏族文化與漢文化之間的矛盾以及學校教育的實際效果是否為藏族家庭所接受，是藏族兒童入學率低的主要原因。

陳耀波和梁在的論文則集中探討城市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在當前城鄉教育二元對立的背景下，民工子女難以享受到與城市兒童相當的教育。作者認為，改變城鄉戶口制度的對立是解決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關鍵。

可以看出，受市場改革的影響，地區之間經濟的差距愈來愈突出，城鄉之間、不同地域之間的教

育經費差距愈來愈大。貧困地區學校教育經費的嚴重不足成為尤為突出的問題。市場改革對教育機會和教育經費的影響已經逐漸凸現，無論宗族、地域、性別還是戶口制度，都不是單一地發揮作用，而是與市場相互交織，影響中國兒童的教育機會。

《改革》的第二個專題是「教育質量」，包括中國識字率的變化、農村學生的學習成績、教師發展等內容。特雷曼 (Donald Treiman) 的文章主要分析中國1927至1976年出生人群識字率的變化。他通過詳細的實證分析表明，教育在中國人口識字水平提高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識字率還與個體的生命歷程有關，如果在非體力勞動部門工作，個體的識字率會提高，而從事體力勞動，識字率就可能降低；生活在城市的人群比生活在農村的人群識字水平要高。文革期間教育荒疏，在這一時期接受教育的人群識字率明顯較文革前和文革後接受教育的人群低，這表明文革作為一個獨特的社會事件對當代中國人的教育獲得產生過重要的影響。該文的重要性也許不在其結論，而是其嚴密的實證分析。

韓怡梅和帕克的論文主要從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農村教師的特徵與農村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成績之間的相關性入手，通過實證分析指出，中國西北農村學生的學業成績差異是多方面因素影響的結果，其中，家庭收入直接影響學生的學業成績和他們對學校教育的態度。

佩因 (Lynn Paine) 和方燕平 (Yanping Fang, 音譯) 從教師專業發展的角度來分析教育質量，認為中國目前教師專業發展的條件和水

平在地域之間、城鄉之間的差異在逐漸擴大，上海教師和甘肅農村教師在專業發展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教師專業素養的整體提升面臨艱巨的挑戰。

丁維莉和萊勒 (Steven Lehrer) 通過教師分布的量化分析，表明重點學校的教師在專業發展和工作經驗方面要高於一般學校。文章以江蘇無錫為研究個案，指出當前重點學校與一般學校在師資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但重點學校的入學機會受到很多條件的限制，並非所有的學生都能享有入讀重點學校的機會。

《改革》一書對教育質量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學習成績兩個層面。市場改革導致不同群體之間經濟收入差異擴大，不同階層子女對學校教育的適應性、在課堂教學中的表現、在學校中的經驗及其原因等微觀層面的問題也與教育質量有關。本書編者及程介明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在導言中稱：「不平等研究日漸關注兒童在學校教育中體驗和學習到了甚麼，然而，這種體驗和學習的差異究竟有多大，我們卻知之甚少。」(頁19) 在中國社會階層日漸分化的背景下，學校教育過程中隱含的不平等問題是更重要的社會學課題。

1970年代，西方教育社會學實現了由宏觀層面的教育獲得研究向學校教育過程研究的轉變，這一轉變最明顯的標誌是從課程、教學、評價等方面來探討學校教育過程。伯恩斯坦 (Basil Bernstein)、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研究集中在英法兩國的階層差異對學校教育過程的影響機制。正是由於這些學者對學校教育過程的社會學分析，對教育質量的解釋在深度上有了突破。伯

中國經驗與西方理論之間的差異，或者經驗與理論之間的「悖離」，才是中國教育研究的真正出發點。《改革》對中國教育質量的研究只是開端，具體的研究尚有待進一步的深入。

本書帶有強烈的政策意識，如農村兒童的入學問題、民工子女和少數民族的教育問題，都是市場改革以來中國教育發展中頗為重要的問題，也是重要的政策問題。

恩斯坦、布迪厄的研究結論是否能夠適用於中國？很少有研究結合中國目前的學校教育過程，來檢視西方關於學校教育過程的理論與中國經驗之間的差異。正是中國經驗與西方理論之間的這種差異，或者經驗與理論之間的「悖離」，才是中國教育研究的真正出發點。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本書對中國教育質量的研究只是開端，具體的研究尚有待進一步的深入。

第三個專題是「市場化與教育的經濟影響」，主要研究中國市場改革以來，農村和城市教育回報的變化。自1960年代舒爾茨 (Theodore W. Schultz) 對教育的經濟價值的經典研究以來，教育回報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目前較為普遍的看法是：在市場較為發達的國家，教育可以提高個人的生產能力，增加個體的經濟回報率。在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市場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教育的經濟回報率明顯低於市場發達國家。早在1990年代初，倪志偉就認為，隨着中國市場改革的深入，教育對家庭的價值逐漸提高 (尼 [Victor Nee, 倪志偉] 著，應星譯：〈市場轉型理論：社會主義社會從再分配向市場的轉型〉，載蘇國勛、劉小楓主編：《社會理論的政治分化》[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697-731)。本書中布勞 (Alan de Brauw) 和羅思高 (Scott Rozelle)、張俊森和趙耀輝，以及莫爾亞—法齊奧 (Margaret Maurer-Fazio) 等應用經濟學模型分析中國1990年代末期的數據，得出一致的結論：改革以來，中國城市和農村教育的經濟回報率都在增加。

不可否認的是，教育的經濟效益不是在真空中產生的，而是與一

個國家的制度安排有直接的關係。趙偉和周雪光的論文延續了倪志偉的研究，認為對中國城市教育經濟回報的估算，不應只限於工資，教育回報在中國不只是一個經濟學概念，不能簡單地通過工資來衡量，教育回報與個體所從事工作的性質、提升機會、權力位置有很大的關係。他們通過數據分析表明，改革以來，教育在個人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逐漸提升，在國有部門與非國有部門，教育的經濟回報率是不同的。按照市場決定教育回報的假設，在非國有部門，教育的經濟回報率要高於國有部門，但統計結果卻沒有顯示國有部門與非國有部門在個體教育回報率上的差異。可見市場對教育經濟回報率的增長只起到一定的作用，中國城市教育回報率的提升有更加複雜的機制，因此要在市場與國家之間相互作用的背景中去理解。他們總結道：「我們不應該將政治過程和市場過程看作是本質上不可調和的，而是應該理解政治與市場，以及它們對城市中國出現的新制度形式和新分層秩序的影響之間更為複雜的互動。」(頁244) 這拓展了經濟學對中國教育回報增長的解釋，更契合中國教育發展的經驗。

本書帶有強烈的政策意識，所選文章幾乎涉及到中國教育改革的所有方面，如農村兒童的入學問題、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和少數民族的教育問題，這些問題是市場改革以來中國教育發展中頗為重要的問題，也是重要的政策問題。如何在根本上確保農村兒童、民工子女和少數民族子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這是中國教育改革必須直面的問題。本書在展示中國市場改革對

教育機會的影響上具有獨特的價值，而導言中提出的政策建議，也契合中國教育改革的實際。

本書的另一個特點是深度的實證研究。書中的十四篇論文中，只有四篇是定性分析，而其餘十篇都有深度的實證數據。文中的數據都具有可靠的來源，不只是引用官方的教育統計年鑒，有些學者還親自到中國來收集數據。這不僅在數據的廣度和深度上有一定的提升，而且在分析的維度和模型上也有一些突破。如李文、帕克和汪三貴在分析學校教育經費時，增加了學校層面的教育經費比較，較之同類研究更加細化。而布勞和羅思高對中國農村教育回報的研究，則力圖在樣本選擇和對學校教育的經濟回報的計算上，改變傳統研究的局限，以每小時的收入作為教育經濟回報計算的根據。

還有一些文章的數據是長期追蹤調查的結果，如特雷曼，以及趙偉和周雪光論文中的數據，是他們前期研究所用數據的延續和拓展，這些數據經過多次的檢驗，具有較強的可信度。特雷曼在分析個體識字率的影響因素時，把學校教育、個體的生命歷程和文革作為重要的變量，依次檢驗這些變量與個體識字率的相關性，經過層層回歸分析，得出的因果解釋具有普遍性。

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改革一個最明顯的特點是國家對市場的干預，這對教育回報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何客觀地呈現和解釋國家與市場的相互作用對教育回報的影響？趙偉和周雪光通過翔實的數據分析，推斷出國有部門與非國有部門在個體教育回報率上並不存在統計學上的差異，表明教育回報的增

長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相互影響的結果。他們的研究彰顯了實證研究的價值，具有相當強的衝擊力。

本書是一次會議論文的合集，不應該用專著的嚴謹邏輯來評價此書。但這並不妨礙我們作以下追問：如何解釋中國教育改革中出現的這些現象？西方社會學、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的教育現象，人力資本理論、結構功能理論、衝突論、現代性理論、新制度主義理論是在研究西方國家教育問題的基礎上提出的。目前在解釋中國教育改革經驗上有兩種較為明顯的傾向：一種是將中國經驗視為發達國家發展的一個階段，這是個過渡階段，既具有發達國家的一些特徵，同時又具有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但從根本上而言，中國教育改革將走與發達國家同樣的路徑。另一種是從中國經驗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來解釋中國教育改革經驗，試圖從中國獨特的社會傳統、政治體制中對中國教育改革經驗作深度的分析。

以教育回報研究為例，這是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教育研究最為透徹和深入的一個領域。按照西方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結論，中國的教育回報率隨着市場改革的深入將逐漸提高，在一個純粹市場主導的社會中，教育的回報率要高於市場不發達、依靠國家計劃調節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的假設是市場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個體的職業和收入是由市場決定的，僱主可能更傾向於僱用那些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而在社會主義國家，職業的分配是由關係和行政權威所決定的，這對教育的經濟回報產生了一定程度的阻滯。但是大量的實證分析也表明，

中國教育回報率增長的內在機制與西方國家有很大差異。如果不分析中國改革以來教育發展的背景，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傳統對教育改革的影響，對中國教育回報增長的理論解釋仍然會較為薄弱。

除少數文章外，本書在深度理論分析方面並不令人滿意。如對私立教育、入學機會、民工子女教育、教師發展的研究，都只是一種經驗的簡單呈現。

在改革過程中，隨着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回報率在逐漸提高。

中國教育改革的經驗儘管可以輔證這一結論，但中國教育回報率增長的內在機制與西方國家有很大差異。如果簡單地沿用這一理論，不分析中國改革以來教育發展的背景，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傳統對教育改革的影響，對中國教育回報增長的理論解釋仍然會較為薄弱。趙偉和周雪光的文章從中國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互動關係來解釋城市中國教育回報增長的現象，展現了中國經驗的獨特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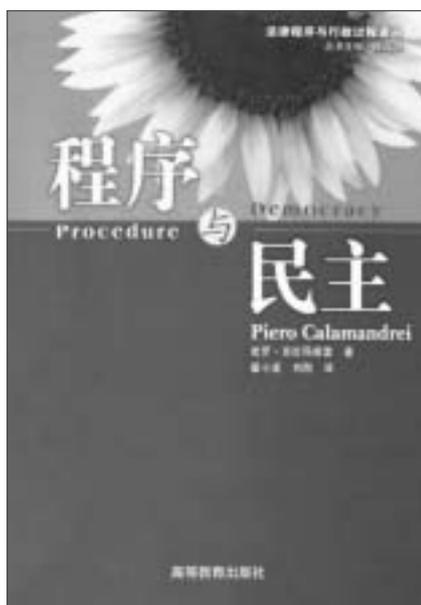
作為一本研究中國教育改革的學術著作，我們希望這本書不只是呈現中國經驗，而是提出更深入的理論分析。但除少數文章外，本書

在深度理論分析方面並不令人滿意。如對私立教育、入學機會、民工子女教育、教師發展的研究，都是一種經驗的簡單呈現。

總之，市場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機制，影響着中國的教育發展。《改革》一書展示了市場改革對中國教育發展的影響，無論是學校之間教育經費的差異，還是私立學校的發展，藏族兒童入學率的徘徊不前，民工子女遊走在城市教育的邊緣，甚或教育回報率的提升等，都深深地鐫刻着中國社會轉型的背影。中國教育改革的經驗已經構成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理論價值正不斷彰顯，本書只是一個開始，中國轉型期教育問題的研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需要更多學者的參與。

## 司法過程的性質

### ● 徐 昕



克拉瑪德雷 (Piero Calamandrei) 著，翟小波、劉剛譯：《程序與民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筆者對克拉瑪德雷 (Piero Calamandrei) 的關注，源於對其得意門生卡佩萊蒂 (Mauro Cappelletti) 的譯介。卡氏是二十世紀最卓越的訴訟法學家之一，他深受老師的影響並深刻地認識到，法律應置於社會經濟和政治文化的背景下來研究，其本身不應作為目的。